

王光和 / 著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 胡适文学思想

XIFANG WENHUA YINGXIANG XIA
DE HUSHI WENXUE SIXIANG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光和 / 著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 胡适文学思想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舒晓利
责任编辑:吴雨时
责任校对:朱 洁
封面设计:原谋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胡适文学思想 / 王光和著. —2
版.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614-5420-6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胡适 (1891~1962)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2549 号

书名 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胡适文学思想

著	者	王光和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420-6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 scupress. com. cn

目 录

导 言	(1)
一、西方影响与胡适文学思想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	(1)
二、发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偶然事件与胡适的文学革命	(8)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17)
第一章 进化论与胡适的语言文学观	(19)
第一节 胡适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	(19)
第二节 历史进化的语言观	(25)
第三节 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	(45)
第二章 欧洲文艺复兴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观	(60)
第一节 白话文学史观的西方背景	(60)
第二节 胡适对白话文学史的阐述	(65)
第三节 胡适对平民文学的提倡	(75)
第三章 西方浸润与胡适的现代文学观念	(92)
第一节 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西方渊源	(97)
第二节 胡适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阐释	(104)
第三节 胡适对自由主义文学观念的阐释	(119)
第四章 英美诗歌与胡适的白话诗试验	(136)
第一节 历史语境的相似性分析	(138)
第二节 诗学主张的相似性分析	(147)
一、胡适与华兹华斯	(147)
二、打破诗体与美国惠特曼自由体诗	(159)
三、《谈新诗》与英美意象派诗歌主张	(163)
第五章 实证主义与胡适的文学批评	(174)
第一节 胡适的现代批评意识	(176)



一、批评话语与批评思维·····	(176)
二、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184)
第二节 科学实证与古典小说考证·····	(192)
一、古典小说考证的西方背景·····	(192)
二、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实践·····	(204)
结语·····	(222)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5)

导 言

胡适（1891—1962），安徽省绩溪县人，现代著名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而成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一、西方影响与胡适文学思想之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

胡适对中西方思想的冲突和影响问题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自觉的意识。1960年7月10日，胡适在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上这样说：

中国与西方的强烈对照和冲突是大约一百五十年前开始的。对着诸位这样有学问的人，这样特别懂得近代历史的人，我用不着重说中国因为无知、自大、自满，遭了怎样可悲的屈辱。我也用不着提中国在民族生活各方面的改革工作因为不得其法，又总是做得太晚，遭了怎样数不清的失败。我更用不着说中国在晚近，尤其是民国以来，怎样认真努力对自己的文明重新估价，又在文化传统的几个更基本的方面，如文字方面、文学方面、思想方面、教育方面，怎样认真努力发动改革。诸位和我都是亲眼看见了这种种努力和变化的，我们中国代表团里年长些的人有大半都是亲身参与过这些活动的。

我今天的任务是请诸位注意与“中国传统的将来”这个题目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几件事。我想我们要推论中国传统的将来，应当先给这个传统在与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对照之后的状况开一份清单。我们应当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国传统在与西方有了这样的接触之后，有多少成分确是被破坏或被丢弃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确是被中国接受了？最后，中国传

导

论



统还有多少保存下来？中国传统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这个对照还能存在？^①

胡适对中西方文化影响关系的分析也同样适合我们对他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分析。作为近现代中国史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对台下听众的追问自然可以看做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反思。

胡适文学思想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日起，就一直是文学界论争的话题。实际上，当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在写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是有一个与梅光迪、任叔永反复进行辩论的过程，其中某些话题就已经涉及对中西文学观念差异的探讨，其时，梅光迪就曾劝诫胡适勿为西方肤浅“新思潮”所“动摇”。梅光迪认为白话诗的写作没有前景，注定要失败，并最早提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特别是白话诗的主张）受到美国等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梅光迪认为胡适是在剽窃西方不入流的“新潮流”到国内贩卖，他说：“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 Vers libre 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 Imagism 之余唾。”^②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有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有心人须立定脚跟，勿为所摇。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③而后，在与学衡派等人的论战以及后续的学术研究中，胡适文学思想与西方“资源”之关系的问题，更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论题。胡先骕曾对《尝试集》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全面否定，认为胡适“模仿西欧颓废派”，“复拾一般欧美所谓新诗人之余唾”，所以才“有如是之失败”，还认为胡适“新诗之精神”“不过枯燥无味之教训主义”、“肤浅之象征主义”、“纤巧之浪漫主义”和“肉体之印象主义”等。^④

胡适自己是承认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的，比如对实用主义哲学、历史进化论的接受，以及对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在内的欧洲近现代文学史的借鉴，但具体到如何受到、受到哪些具体的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影响的问题，胡适却一直语焉不详，或回避，或否认，这给后来的相关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比如胡适在与徐志摩的一封通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① 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徐高阮译，1960年7月21日至23日台北《中央日报》。

②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1922年第1期。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378页，岳麓出版社，2000年版。

④ 胡先骕：《评尝试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第26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实秋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又说我“对于诗的基本观念大概是颇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的”。对于后一句话我自然不能否认……但我当时的希望却不止于“中文写的外国诗”，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不仅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也不仅是“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诗的诗意”的诗。^①

胡适并没有否认他的文学思想（包括白话诗）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只是没有进行详细和深入地说明。但他在美国的留学日记（1916年）中，又说：“夫吾之论中国文学，全从中国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欧西批评家发何议论。吾言而是也，其为 Utilitarian，其为 Yolstoyan 又何损其为是。吾言而非也，但当攻其所以非之处，不必问其为 Utilitarian，抑或 Yolstoyan 也。”^②胡适强调的是，只要他说的有道理，那么他的思想与西方的什么人、什么思潮相似，又有何妨？胡适认为，这种相似反而恰恰印证了“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的道理。也有研究认为，这应该是胡适与梅光迪论辩时的激愤之词，或是论辩的策略，但无论如何理解，胡适文学思想到底如何受西方影响确实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胡适 1917 年 1 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及时给予了回应，并在 2 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赞同并拥护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推崇胡适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确立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发起者的地位。陈独秀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胡适文学改良思想受到西方的浸润，同时也及时推出了自己同样受到西方影响的文学主张——“三大主义”作为呼应，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③

1922 年康白情发表《评胡适的诗》^④，对胡适白话诗创作进行了评价，其中主要谈到胡适白话诗的两个特点：一是“说理”倾向，二是带有美国风（美国的影响）。最早将胡适的新诗与美国意象派诗联系起来的是刘延陵。他在

① 胡适：《寄徐志摩论新诗》，1931 年 12 月 14 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205 期。

②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1934 年 1 月 1 日《东方杂志》第 3 卷第 1 期，见《胡适文集》（1），第 15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③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 年 2 月 1 日《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

④ 北社同人编：《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出版，1922 年版。



1922年2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美国的新诗运动》一文中说：“新诗（The New Poetry）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国所特有”，他还详尽地列举了意象派的六条主张，并在第四条（“求表现出一个幻象，不作抽象的话”）之后的括号里说：“详见胡适之先生论新诗。”^①这里的“论新诗”指的是1919年10月发表的《谈新诗》。1922年8月17日，闻一多在其一封寄往清华文学社的英文信中写道：“You may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at our literary insurgent Dr. Hu Shi’s（八不主义）is not quite of his own invention either. I shall copy several of credo of the Imagists, a school of ‘new’ poets of whom the greatest living woman poet, Miss Amy Lowell is the leader.（胡适博士的‘八不主义’并不完全是他的发明，他可能是复制了以伟大的女诗人艾米·罗威尔为旗手的意象派‘新’诗人的信条）”^②梁实秋在1926年说：“在美国英国有一部分诗家联合起来，号为‘影像主义者’，罗威尔女士，佛莱琪儿等属之。这一派唯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我想这一派十年前在美国声势最盛的时候，我们中国留美的学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响。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列有六条戒条，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③朱自清在其《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指出，胡适的理论主张受到“美国意象派（朱自清译为影像派）的影响”^④。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是新诗的“开山鼻祖”，《谈新诗》是早期白话自由体诗创作的金科玉律。

之后的周作人也发现胡适文学思想里有西方的成分，“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 and 主张了”。^⑤但他更强调的是胡适文学思想的本土资源，认为《文学改良刍议》就是明代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现代版。同时期，胡适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也得到了关注。1935年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对胡适改良中国戏剧的理论主张作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洪深肯定了胡适对西洋戏剧的提倡，尤其肯定了胡适对易卜生提倡“健全的个人主

① 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1922年2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2号，见《中外文学关系史料汇编》（下），第751—7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第5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浪漫的与古典的》，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陈希：《胡适与意象派》，《鄂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⑤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见《论中国近世文学》，第59页，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义”的社会问题剧的引进。

80年代之后，海外的一些胡适研究成果也逐渐传到大陆。费正清的弟子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后来的译本多译为格里德）在《胡适之评传》[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译为《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中认为，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是受了在美国的经验的启发。他说：

由胡适在美国的经验看来，若求得这种历史演变的趋势的应验，端在普及教育……胡适对早年的改革者批评得很苛刻，因为他们未能承认语文改良与新思想传播两者之间的关联……他对世纪初以拼音字母代替汉字的构想，也批评得同样苛刻。此种计划早已注定失败，因为抱此主张者不愿完全放弃汉字。若不能免除这一步，结果必致“把社会分作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佃氓佃民……拼音文字不过是士大夫丢给老百姓的一点恩物。^①

夏志清也是较早的一位胡适研究者，但他的观点前后有些变化。他早期的观点认为，胡适是受到包括意象派诗在内的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夏志清在《文学革命》一文中认为胡适明显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史上，一种文学的类型，其发展能够不因批评界的漠视和敌意而受到阻碍，倒不见得是一件这样不寻常的事。就拿英国的例子来说罢。没有几个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家敢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严肃的文学的。而亨利·菲尔丁和山姆·理查逊这两位小说家的地位，在十八世纪英国读者心目中，是难与蒲柏（Pope）和弥尔顿相比的。如果胡适不是在西方文学的传统中找到了这个保证，那么，他学问再好，批评眼光和胆色再大，也不能给中国文学带来这么一个反传统的看法。正因为他深知自但丁和乔叟以后，‘国语文学’在西方文学中成了主流；戏剧和小说在西方所享受到的崇高地位——他才能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看法。同样地，在阐释中国思想史方面，胡适也借助了西方较为精密的一套哲学专门术语和名词。”^②但夏志清后来（1979年）对自己的观点又进行了修正，认为胡适提倡白话诗没有直接受到意象派诗人的影响，认为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是建立在对中及欧洲文学演变史的深刻了解之基础上的，与当时英美

① 贾祖麟 [美国]：《胡适之评传》，张振玉译，第72—73页，北京：南海出版公司，1992年版。

② 夏志清：《文学革命》，见《文学的前途》，第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诗界的革新运动没什么关系。理由是，胡适留学日记里没有什么证据，而且意象派当时在美国并没多少读者。^①

唐德刚和周策纵认为胡适文学改良思想是受了美国文学革命（即所谓的美国本土成长的“乡土文人”与留学英法的“哈佛派”等经院派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文学论争）的影响。唐德刚说，从胡适对“白马社”里新诗所下的评语，他对胡适早年所受到的西洋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并说周策纵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当年胡适提倡“文学改良”是受美国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胡适之的文学观，正是这一派！（唐德刚指经院派，但胡适在文学形式上又倾向‘乡土派’）胡适所提倡的‘八不主义’只是纯技术性的‘改良’。至于文言文学的内容，胡适之并没有要求把它扫地出门。可是当时的美国文学改革运动，在文学技巧方面并没有太大的争执。他们争的是文学的内涵，是以美国社会背景为主题的乡土派文人向经院派革命的斗争。”^②

周明之指出，胡适虽然阅读广泛，但在美国时，更为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学所吸引。比如他对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法国剧作家白里欧、德国剧作家赫什特曼等人就非常欣赏。而且1916年的下半年，胡适表示同意陈独秀中国文学“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的观点。^③

方志彤非常坚决地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八项主张是在英美意象派诗学主张影响下才产生的。他说：“All in all,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deny that the eight - point program was inspired by Imagism. Ezra Pound was the God-father, and Amy Lowell the God-mother,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 of 1917.（总之，八点文学主张确实受到了意象主义的启示，这是不容否认的。庞德1917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教父，罗维尔则是教母）”^④

周质平的《胡适文学理论探源》一文延续了周作人的观点，认为胡适的文学思想最主要还是从对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的观察中得出的，但他也承认胡适文学思想受到了西方影响。他说：“将胡适的文学理论依附到欧美‘意象主义’上去，这一方面低估了胡适出国之前，在中国文史中十余年的浸淫，以及中国

① 夏志清：1979年1月《现代文学》复刊第6期，见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1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88—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167—1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Achilles Fang, “From Imagism to 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 A search for Poetics That Failed”, in Horst Franz and G. L. Anderson, ed, Indiana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Oriental-Western Literary Relation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5), pp. 180—181.

文学批评所带给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自孔子以来既已深植人心的‘辞达而矣’的朴实传统。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胡适的文学理论曾受过西洋的影响，而设法为他加一个‘国产’的标记；我所不能同意的是：将庞德与罗威尔说成了中国文学革命的‘教父’、‘教母’，似乎没有这两位美国诗人，中国文学革命就要流产，至少也要延缓，而胡适的文学理论也将大为改观。这样的说法，未免过分夸大了西洋文学理论对胡适的影响。”^①

新加坡的王润华认为“意象主义被移植到了‘八不主义’中”，并表示“胡适有意隐藏他所受西方‘意象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企图以一种‘本土’的面目示诸国人”^②。

新时期之后，王锦厚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几乎全是从意象派那儿移植过来的”。^③刘新民说：“胡适……的‘八不主义’，便脱胎于意象派的‘六条原理’和‘三项原则’。”^④陈希认为，“意象派对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和新诗创作以直接的启发和影响，这个说法应该可以成立”。^⑤徐改平认为，胡适从中外文学史的观察中得到了发动文学革命的信心和勇气，受到“鼓荡和激励”^⑥。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将胡适的译诗作为个案来研究，揭示了作为翻译主体的胡适，在翻译这种社会行为中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并描述诗歌翻译从主题到形式，再到语言转型、白话诗体最终成为诗歌翻译正宗的演变过程，以及白话译诗与白话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⑦程巍在《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及其西方学理依据》一文中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尽管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文学资源，袭用了前人的观点，但却从西方文学理论资源中为白话文学找到了新的基础，并认为胡适误解误用了他拿来作为文学革命观的学理依据——“文言合一论”和“历史进化论”。^⑧

综上所述，西方文化对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问题争论已久，且众说纷纭。这其中既有研究材料的发现和选取方面的原因，也与研究者的立场和倾向有关。因此，如果要对胡适与西方的“影响”关系问题作更全面深入的探讨，就

① 周质平：《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第16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王润华：《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中国新文学史中一个被遗漏的注脚》，见王润华《中西文学关系研究》，第227页，东大图书公司（台北），1978年版。

③ 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第2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刘新民：《意象派与中国》，《国外文学》，1994年第2期。

⑤ 陈希：《胡适与意象派》，《鄂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⑥ 徐改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⑦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第3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 程巍：《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及其西方学理依据》，见周启超主编《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25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必须对胡适文学思想中的主要论题作客观细致的考察，并就中国传统文学如何对胡适在吸收西方文学观念时所产生的内在制约进行合理的把握。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文学革命”这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从“事件”发生的场景中考察胡适身上所发生的中西方思想交汇的线索和面貌。

二、发生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偶然事件与胡适的文学革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胡适在《口述自传》里回顾了他所经历的文学革命历程，并作了这样的总结：他之所以能在美国倡导文学革命，竟是源于1915年发生的几起“小小偶然事件”^①。正是这些“偶然事件”的推动才使胡适一步步走上文学的道路，“以后两年我致力于语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胡适坦诚地说，“留美的七年间”，“有许多课外的活动”，影响了他的“生命和思想”。^②

首先是“钟文鳌”事件（1915年）。事情起因于一个叫钟文鳌的人所写的小传单：1910年秋天胡适到达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作为庚款留学生，他每月都要收到一张从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送的支票。在这张支票的信封里，总有一张由主办书记私下插入的小传单。这张传单的作者叫钟文鳌，出身于上海的圣约翰教会学校，热心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他所写的小传单的内容有一条就是关于文字改革的：“废除汉字，改用字母！”胡适回忆说，他平时对这些小传单并不在意，可是在1915年，他突然对这些小传单心生不满，想回敬一下，便写了一张小条子：“像你（钟文鳌）这样的人，既然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字[而偏要胡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③但字条寄出之后，胡适又觉得十分懊悔，觉得“不应该对这位和善而有心改革中国社会风俗和语言文字的人这样不礼貌”，也使得胡适觉得他和他的朋友“这些够资格的人实在应该在这方面用点功，把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问题都提出来检讨检讨”！之后，胡适开始关注语言文学问题，并与同在康乃尔的赵元任谈论语言文字问题。同年夏天，胡适写《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任鸿隽写《泛湖即事》。这两首诗的写作随后掀起了轩然大波，进而引起了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之间关于用白话写诗的讨论和辩难，从而促使胡适对自己“仍然是很模糊的”文学观念进行“更严肃的思考”。思考的果实结于“1916年2、3月之际”，使得胡适“对中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1），第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第308—309页。

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①，并最终导致了文学革命的发生。

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直接催生了中国新文学，被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其标志是1917年1月身在美国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此为界，《文学改良刍议》宣告了旧文学即将从文学舞台上淡出，从而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大幕。其后，在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众多同道者的共同努力下，文学革命在不到几年的短暂时间里便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然，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文学革命的发起和成功并不是如胡适所说的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承袭和对西方文化资源的吸收、模仿、借鉴的双重基础上产生的一个结果，胡适强调的只是“事件”发生的偶然性。当时的胡适正好兼有这双重“资源”，从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质变“临界点”上，触发了文学革命的引信。可谓“时势造英雄”。胡适确实“心领神会”并抓住了这个“时势”，把自己造就成了“英雄”。

胡适发动的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响应，并且超越晚清的改良先驱，最终走向成功，首先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唐德刚所说的“时势”因素^②。胡适1910年秋天到达美国，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系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专制体制被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瓦解之后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使民族工业有了难得的发展机会，新兴社会力量逐渐产生，这就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基础；另外，科举制度的废除（1906年）、新式教育的兴办以及清末以来陆续派遣的大量留学生，也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兴的知识阶层。他们之中很多人学贯中西，掌握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具有世界性的开阔视野。而这样一批新型的知识阶层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文学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关键人物。^③

同时，辛亥革命之后的十多年，由于封建思想统治的土崩瓦解，新的统治体制并不稳定，加之军阀长期混战，使得社会处在一种“难得”的混乱无序而又宽松自由的状态之下。既混乱又比较自由的氛围，反而“有利于突破常规的独立思想，有利于容纳多元的外来思想，有利于对传统大胆的反省。知识分子

①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1），第3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同上，第322页：“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便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这虽然多少也是那时的‘时势’所铸造出来的……”

③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的文化视野空前开阔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条件也成熟了。”^①胡适对这样一种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也有过积极的评价，“辛亥革命的政治的意义不止于此。帝制的推翻，虽然好象不曾费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里，这件事的意义是：‘连皇帝也会革掉的！’这是中国革新的一个最深刻的象征。辛亥以前，中国人谈了四五十年的改革，实在没有改变多少。”“在辛亥以后，许多私人提倡的改革事业都可以自由发展，不能不说是政治革命的恩赐。即如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的教授提倡的白话文学，在当时虽然也有林纾先生们梦想有大力的人出来干涉，究竟没有受着有效的摧残。若在帝政之下，我们那班二十多岁的青年压根儿就不能走进京师大学堂的门墙里去讲中国学问，更不用说在‘鞅轂’之下提倡非圣无法的思想了！民国十三年以后的政治社会的改革当然是比辛亥革命激烈的多了；但若没有辛亥革命的政治大解放，也决不会有这十年来的种种革命。辛亥革命变换了全国的空气，解除了一个不能为善而可以为恶的最上层高压势力，然后才有各种革命的新种子在那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②

我们说，胡适的文学革命的“新种子”就是在这样一个“解放的空气里生根发芽”，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当然，这个“新种子”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正如前面所说，它是吸取了中西方的双重资源而培育出的“种子”，或者说是中国的“种子”在西方的“土壤”里“发了芽”。

首先，文学革命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承袭，最明显的可以追溯到晚清。文学改良的思想在晚清就已经萌芽、发生。我们可以把晚清的很多文学改良活动当做胡适文学革命的先驱，当成文学革命的前期铺垫和蓄势。晚清时期，文学发展迟滞不前，很多诗文大家都积极从事文学改良活动。龚自珍“注重个体、倡导改革”，“抒写个人遭压制、个性被扭曲的痛苦”，其“思想、创作实与文学革命存在明显相通之处”^③。而后，黄遵宪憎恶“俗儒好尊古”，疾呼“我手写吾口”^④；谭嗣同尝试新学之诗，“力图在诗中运用新的词语”^⑤，他的诗中不仅有“杀风景”的口语，也有外文的音译之词，这与新文学中的新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通的。梁启超是晚清文学改良的中心人物，他在前人的

①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胡适：《双十节的感想》，1934年10月14日《独立评论》第122期，见《胡适文集》（11），第4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第509、5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

④ 同上，第523页。

⑤ 同上，第531页。

基础上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强调诗歌要有“新意境”、“新语句”和“古风格”，并且已经注意到语言与思想的内在关系，指出离开了“新语句”，就“无法表达新思想——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①。在小说方面，他提出了“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小说界革命”以及为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的“文界革命”。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等历史条件没有成熟，以上所有这些热情澎湃的文学改良活动大多是昙花一现，均未取得多少成功，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的精神”^②却为“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所直接承袭，成为胡适文学思想的最直接的本土文化资源，并为其“进化的文学观”和“语言进化论”提供了本土传统中的证据。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清末民初域外小说的大量翻译和发行传播，更是刺激和启发了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作家，他们在模仿和借鉴西方文学资源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学和近现代的世界文学进行比较，从而打破思想封闭状态，开始与世界文学“对话”和“接轨”，给污浊沉闷的清末文坛注入外来的新鲜血液，“引起中国文学内部结构的时代变迁”^③。

在语言改革方面，晚清期间有过不少的尝试，并留下了丰富的积淀，到最后甚至形成了提倡白话的蓬勃运动。而晚清白话文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照吴福辉的话说，晚清时期对白话文的形成起促进作用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近代域外小说特别是西洋小说的翻译，使文言出现了“松动”，出现了一种词法、句法并不严格、有弹性的文言，其中夹杂不少的口语词以及外来词，这方面以林纾和苏曼殊的翻译为代表；其次，近代和晚清小说《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等所使用的白话文日渐发展，成为“过渡的白话”；再次，白话报刊大量涌现。据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民办报纸由19种增至70种，而其中绝大部分均属白话报纸。辛亥革命以后，白话报刊数量猛增，到1919年5月之前，白话报刊多达180多种。^④白话报纸的大量发行，促使了早期白话文在民间的流行。据统计，当时以《无锡白话报》、《民报》为代表的白话报刊达200种以上，分布在全国各地。黄遵宪提出“白话工具论”，裘廷梁呼吁提倡白话文，“崇白话而废文言”，并和侄女裘毓芳一

① 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第5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

②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同上。

④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丛刊编辑部：《新文学史料》（3），第48—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起于 1898 年创办了《无锡白话报》，梁启超创立了“新文体”，提倡文字要浅白、生动、平易晓畅，强调言文合一。而卢戡章、蔡锡勇、王炳耀、王照等晚清创造拼音字母的尝试也为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前车之鉴。特别是王照，胡适说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的主张有许多地方和后来主张白话文学的人相同。”王照主张“言文一致”，要文字“当语言之符契，要文字跟着那活的语言变迁”，其主张的逻辑的结论最后必然是提倡白话文了。王照的字母是专门拼写白话的，“此字母……专拼俗语，肖之即无误矣”，而不是用来拼古文。王照的字母运动后来得到劳乃宣等很多要人名人的同情和赞助，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也没能成功。^①而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就参与了白话报《竞业旬报》的编辑，曾作白话文字《地球是圆的》，还作了白话小说《真如岛》。这些报纸的兴办不仅在去除“妇孺农畛，靡不以读书为难事”，“学文数年，而下笔不能成一字”^②的文言弊端和开启民智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而且也培植了民间社会对白话文的“需求”，为“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因此，可以说晚清“松动的文言”是为“五四”白话准备了“转变”的环境，提供了大量渗透和引用外来词汇和句法的初步经验，而晚清“过渡的白话”为“五四”白话直接创造了样本。^③当然，这个样本在“五四”还需要用外国的工具和材料进行新的打磨和润色。而且，晚清白话文运动“一面编报纸，写白话文，一面却用深奥古雅的文言进行著作。他们将白话作为一种应用的权宜之计，他们没有真正提高白话的文学价值。一边是有艺术价值的文言文，一边是纯粹应用的白话文”^④。而真正推翻文言文学，建设有艺术价值的白话国语文学只能留待胡适他们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过程中去解决。

1909 年刘师培从历史进化的观念出发对白话文运动作出了预言，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在 1909 年 4 月 25 日—26 日《警钟日报》“社论”栏目《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中说：“然事物之理，莫不由简而趋繁，何独于文字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文质深浅之殊，而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斯宾塞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而质，由深而浅耳）。故就文字进化之公理言，则中国自近代以还，必经白话盛行之一阶段，此由可预测者也。”^⑤民国四年的黄远庸在《甲寅》上的《通讯》一文里

①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1934 年 1 月 1 日《东方杂志》第 3 卷第 1 期。

② 梁启超：《论幼学》，见《梁启超全集》（2），第 589 页，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

③ 吴福辉：《“五四”白话之前的多元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 1 期。

④ 旷新年：《胡适与文学革命》，见《胡适评传》，第 23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版。

⑤ 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第 120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版。